



# “第二个结合”视角下中国“和合”思想的当代转化

向汉庆, 孙宏川

(湖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株洲 412007)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与文明冲突加剧的背景下,“和合”思想由于历史叙事的局限与表达形式的陈旧,难以在现代激发完全的生命力,亟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其实现创造性的转化。从内在机理看,马克思主义在价值层面强调“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合”思想追求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皆蕴含着对人的解放的理解。思维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强调矛盾的对立统一,“和合”思想主张“阴阳相济”,皆包含着辩证法理念。两者既有所区别又高度契合,在实践中互为滋养,不断完善。从转化内容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激活“天人合一”自然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念激活“贵和尚中”交往观、马克思主义人民利益观激活“义利相兼”义利观,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激活“天下为公”天下观,在新时代不断为“和合”思想注入鲜活生命。从现实层面看,将“和合”思想转化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和谐共处的践履原则,为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共同繁荣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 “和合”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 “第二个结合”; 中国智慧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5)12-0657-09

## The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traditional "Hehe"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XIANG Hanqing, SUN Hongchua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ntensified civilizational conflicts, the concept of "Hehe" philosophy is difficult to fully activate its vitality in modern times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outdated forms of expression. It urgently needs to be creatively transform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From an internal mechanism perspective, Marxism emphasizes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t the value level, and "Hehe" philosophy pursues the unity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aspects, both of which contain an understanding of human liberation. At the thinking level, Marxism emphasiz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opposites, while "Hehe" philosophy advocates for "yin-yang harmony", both embodying the essence of dialectical philosophy. While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the two exhibit a high degree of synergy, mutually enriching and refining one another through practice. In terms of transformative content, both of them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invigorate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from the Marxist ecological perspective, revitalize the philosophy of "valuing harmony and embracing moderation" in social interactions with Marxist dialectics concept, reanimate the principle of "balancing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with the Marxist view on serving the people's interests, and renew the ideal of "Hehe" with the Marxist vision of human liberation. Together, these efforts continuously infuse the concept of "Hehe"

with renewed vitality in the new era. In practice, transforming the idea of "Hehe" into the principle of practic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can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to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Hehe" philosophy;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Marxist theory; "the second combination"; Chinese wisdom

何谓“和合”?张立文先生在《和合学》中阐释:“和”代表着和谐、协调等意(多指一种状态)，“合”代表着融合、结合(多指手段、方式)<sup>[1]</sup>。“和合”思想承载着中华文明对和谐秩序的价值追求,代表着“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sup>[2]</sup>,涵盖阴阳相济、矛盾统一、万物共生的整体宇宙观。当前学界关于“和合”思想的研究中,张立文<sup>[3]</sup>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个方面出发,论述了其在构建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中的重要意义;陈霞<sup>[4]</sup>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溯源,探究“和合”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联以及“天人合一”自然观、“天下为公”治理观及当代价值;吴楠等<sup>[5]</sup>分析传统“和合”文化的理论内涵,结合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的问题,探究“和合”文化核心理念的当代启示;方盛举等<sup>[6]</sup>从“和合”文化源流出发,探究其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意义。

当前学界虽关注到“和合”思想与当代世界的关联性,却较少从“第二个结合”的视角剖析其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机理——即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指导下实现传统思想的内在升华。在经济全球化与文明冲突背景下,传统“和合”思想中“天人合一”自然观、“贵和尚中”交往观、“义利相兼”义利观、“天下为公”天下观等核心智慧,因其历史叙事的局限与表达形式的陈旧,在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国家与国家四个方面的和谐关系中难以充分彰显时代价值。而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其进行激活,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以理论创新解决时代新问题的历史必然。因此,本文从三重维度展开探讨,首先通过价值互鉴机制,从理论与历史根源揭示马克思主义与“和合”思想转化的可能;其次借助批判性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合”思想的当代局限,明确新时代转化的内容与方法;最后立足全球化导向,将“和合”思想转化为全球共同体治理的“中国方法论”,为构建和平发展的新型国际秩序提供范式参照。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两个结合”的学理阐释,也为传统哲学智慧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兼具历史厚度与现实向度的分析路径。

## 一、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与“和合”思想的耦合机理

在价值维度上,马克思主义倡导“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价值主张,这与“和合”思想中个体所追求的“心灵和谐”,物质与精神统一的目标相契合;在思维层面,二者均承认现实生活的统一性,秉持唯物辩证法,强调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与发展,存在深层共通。这种价值与思维层面的耦合,构成了两者融合转化的哲学基础。在新时代,探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耦合机理,既是证明二者何以可能实现“结合”的理论需要,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现实需求。

### (一)价值维度的契合

对于个体而言,自由是个体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中选择独立性的综合价值能力体现。马克思指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sup>[7]</sup>。“意识”指向个体的主观精神世界,“活动”则是基于现实的人的“客体主体化”的改造。所以,人的本质可以理解为客观世界与主观意识的统一,是在现实基础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8]135</sup>。社会是人类为了自身发展,在自然环境中所建立的结构关系,但由于历史阶段、生产力、法律等因素的不同,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秩序、体制也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人类本身。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sup>[9]197</sup>,人相对于动物,其类本质也从优点转化为缺点。根据马尔库塞的观点,在这种社会中,特殊的集团为了利益,创造出“虚假需求”,并且这种“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是受外界支配的”<sup>[10]</sup>,个体本身无法控制。人们看似自由的选择,但其本质上却是资产阶级的引导,是为了淡化个体批判意识。物质本是上层建筑的基础,人类更进一步追求的应是精神超脱。但在此情况下,人成为物质的奴役,也成了“物化者”。Nussbaum<sup>[11]</sup>提出,“物化”内涵之一就是“否认主体性”,物化者“将对象看成某种不需要考虑其经验和感受(如果对象确实具有的话)的物品”,人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也一定程度上否认了他人的主体性,单一的劳动形式和封闭的社会结构

限制了个体自由,自由被社会与自我所禁锢。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就是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发展,“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12]</sup>,所有自由人联合才能保障个体在历史的动态过程中的独立,从而摆脱束缚,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活动形式,实现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价值取向、精神生活的形成同样受到物质条件制约。古人提倡物质生活先于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物质资料是人类生存的第一步,只有饱衣暖食,才可能明人伦,谈性善。但从文化病理学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物资匮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水平低下,此种环境不制反生,发展出“反向动力”,人们对内在世界的向往激增,催生了以“内在超越”“内在和谐”为目标的“和合”文化价值体系,呈现出百家争鸣之态。如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为首,修身的目的是为何?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曰:“万物各得其所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不难看出,修身是为了统一在对待不同人、事、物之间的分殊性时依旧保持的平等观,它不但代表着人与自身心灵的和谐,更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生。道家强调“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进一步将阴阳宇宙观引申为物质与精神、身体与心灵的动态平衡,实现人的本质追求。可见,在满足基本生存条件后,过于追求物质生活,容易陷入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陷阱;过于追求精神生活,则容易脱离现实,掉入幻妄,而现实的关键恰恰在于能动的改造。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合”思想倡导和谐、和睦、和生。二者在解决工具理性所带来的价值缺失、寻找物质与精神的平衡方面目的契合,共同指明人类未来发展总体方向。

## (二)思维层面的共通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天人二分”的思维路向,其主张的“现实生活世界统一论”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和合”思想相共通。西方传统哲学强调绝对精神或理念的先在性,认为世界只是精神和理念的摹本和映象,如柏拉图的“意见世界”和“理念世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陷入“天人两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均认为,世界是自然、人类、社会共生的有机统一体。老子以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道德经》)阐释本源,强调“道”融于万物的和谐性。按照《淮南子》的解释,道即为“一”,“二”则为“阴阳”,“三”意味着“阴阳合和”,而“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既生万物,又融于万物之中,道代表着和谐与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以“物质客观实在性”揭示世界统一性,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且物质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具有客观实在性。二者关于本原的认识虽有差异,但在关于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辩证统一的思维路向上高度契合,皆主张世界“统一论”。

冯友兰认为,张载的“和合”思想蕴含客观辩证法,“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sup>[13]</sup>宇宙万物一体两面,可为阴,也可为阳。阳与阴的事物互相对立,反向而为产生矛盾。“反者道之动”,物极则必反,最终对立的双方势均力敌,归于和谐的一体。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进一步指出,矛盾如太极,“无极而生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阴阳两面的和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动与静的动态过程中实现。太极的阳与阴,是一段时间内阳盛阴衰,另一个时间段则阳衰阴盛,矛盾的两面无法消灭另一方,两者不断地冲突、融合,才能达到张载说的“仇必和而解”与周敦颐笔下的“两仪立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矛盾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不同事物之间的矛盾不同;同一事物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矛盾不同;同一矛盾的正反两个方面各有不同。其中事物矛盾的不同性与“和合”思想中万物“有斯有对”所共通;矛盾不同时期的不同发展与“和合”思想讲究的“动生静,静复动”的动态过程所共通;矛盾的一体两面性与“和合”中的阴与阳所共通。此外,从矛盾解决的方式来看,马克思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sup>[8]225</sup>,其中矛盾双方的“共存”与“和合”思想中阴阳“相济”的思想所相似。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和合”思想均认可矛盾的必然性,追求在对立中实现辩证统一与动态和谐。

## (三)实践进程中的双向滋养

“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sup>[14]</sup>“魂脉”有根才能立本固元,“根脉”有魂才能开新致远。“和合”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智慧之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魂脉”

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以科学方法论激活了“和合”思想的“根脉”,赋予传统智慧时代生命力。这种“魂脉一根脉”的双向滋养,铸就了“和合”思想深度融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如“大同”理念作为“和合”思想中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理念,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实践政策与方针之中。毛泽东是“大同”理想的追随者,他曾“使用‘大同境域’‘太平世界’等话语来通俗阐释共产主义目标”<sup>[15]</sup>,但他所指出的“大同境域”与传统的“天下大同”概念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一方面,在目标上,他所追求的“大同”是站在马克思全人类解放的角度,是要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sup>[16]</sup>;而传统的“大同”社会,存在着“华夷之辨”的边界,主要指的是“天下”,即当时的中原及周边地区。另一方面,在手段上,毛泽东强调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为消灭阶级剥削、资本压迫创造条件;而传统社会所提的“大同”只是孔子基于三代圣王治世的提出的理想状态,是对尧、舜、禹时代“大道之行”的复归,并没有具体提出当下或者未来社会进入“大同”的实践路径。毛泽东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本本”中的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sup>[17]</sup><sup>[11]</sup>，“大同”概念的改造与激活完美阐释了这一观点。这些形象表达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悄悄“落地生根”,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也是“科学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晶”<sup>[18]</sup>。“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在儒家思想中,“小康”与“大同”的哲学概念相对,是“大同”社会的一个阶段。它指的是君主通过仁爱礼治,使人们达到“暖衣饱食”的基本和谐状态。而邓小平所指的“小康”社会是在解决温饱后“丰衣足食”的发展阶段。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与国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sup>[19]</sup>,要在实践中全方位、全过程坚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没有讲到的东西,也在实践中创造出来。“小康”社会是马克思未提及的,但邓小平却以传统“小康”的概念讲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将儒家的和谐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深度融合,让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悄然发芽”。

新时代,习近平延续了邓小平的“小康”理念,在脱贫攻坚战中,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sup>[20]</sup>的庄严承诺,通过中国共产党人8年间的艰苦奋斗,实现了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同时,习近平立足于当今全球化的背景,将全球的人类置于“天下”的中心,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sup>[21]</sup><sup>[51]</sup>。“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天下大同”的思想一脉相承,但展现出了更为开阔的全球视野、更为包容的世界胸怀以及大国应有的责任担当。这突破了中华民族独自发展的视野,超越了地理与民族的界限,为传统的“天下观”赋予新的内涵,彰显着中国文化的底色。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共同体”思想的发展,是以天下一家、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和合”思想的“根脉”滋养马克思主义“魂脉”的典范,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枝散叶、开花结果”。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滋养,贯穿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前者以科学性激活传统智慧,后者以文化基因丰富理论内涵。二者一体两面、不可分割,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守正创新中持续发展。

## 二、何以转化:马克思主义激活“和合”思想的基本条件与主要内容

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需“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sup>[22]</sup>。

而关于激活的方法论,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sup>[23]</sup>作为中华文明核心智慧之一的“和合”思想,在新时代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为其“天下为公”天下观、“贵和尚中”交往观及“义利相兼”义利观等思想赋予现代生命,突破其内涵的时代局限性,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精华与传统“和合”思想的融会贯通,这正是可行的转化路径之一。

### (一)马克思主义激活“和合”思想的基本条件

激活“和合”思想的生命力并实现创造性转化,需以“第二个结合”为路径,并且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坚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理论都必须服务于社会实践,才能真正具备现实意义。“和合”思想的激活,必须扎根现实社会生活。只有立足于全球化的背景,通过与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历史语境及人民需求相结合,才能彰显时代价值。具体来看,“和合”思想的转化需整合三方面资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创新理论,以及世界各国积极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知识,以此塑造“和合”思想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指出,要“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sup>[21]150</sup>。每种文明都蕴含着独特的内在价值,为了让世界文明之园更加多彩、生机盎然,中国应当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维护各民族文明的多样性,以互相交流、学习和借鉴代替隔膜、排斥与博弈,创造出中华文化的繁荣景象。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正是“和合”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焕发新生的内生动力。

其次,确立中国共产党在转化进程中的核心引领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在新时代的 leadership 地位,既体现在政治、经济、生态等领域,也体现在对文化思想的引领上。“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盐铁论·忧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探索解决中国社会难题的新方法,把文化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群众身上,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需要。毛泽东指出:“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sup>[24]</sup>习近平也强调,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与中华文化的独特历史传统与历史命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批判性的继承,创造性的发展,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sup>[21]150</sup>。无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传播提供了根本保障,助力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

最后,确保在激活进程中秉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筑牢“和合”根基。“和合”思想的当代转化,关键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将其内核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结合,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以科学的方法论从而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创生,激活其内在的时代价值要素。马克思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sup>[8]169</sup> 这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不再仅仅是观念上的,而是由经济、生产力等物质因素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推动历史发展。如今,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世界共同发展原则,奉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向全世界展示其所谓的“文明优越”,破坏了国际秩序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资源无序竞争。而中国在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世界,尊重世界历史的潮流,高举以对话解决矛盾、以开放取代封闭、以包容取代战争的旗帜,倡导共建共享的多边主义与文明之间平等的互动与交流。这不仅是对“和合”思想中仁爱精神的传承,也是对国际秩序的马克思主义式创新阐释。

## (二)马克思主义激活“和合”思想的主要内容

### 1. 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激活“天人合一”自然观

“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成圣。”(《正蒙·乾称篇》)“天人合一”的概念最早由宋代哲学家张载提出,蕴含“民胞物与”的圣人理想。“天人合一”观念并非单一学派的主张,而是中国古代哲学对人与自然、宇宙关系的综合思考,经多流派长期丰富完善。儒家孔子称“天生德于予”、孟子言“诚者天之道”、董仲舒主张“天授命于王”,均赋予“天”人文神性以论证伦理;荀子视天为自然,强调“君子理天地”的共生关系;道家老子则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将“天”归为道衍生的平等存在,超越神性与自然性的简单界定。

传统自然观存在双重局限:“神性之天”易催生宿命论,“自然之天”则过度强调人类对自然的依附性而忽视人的能动改造性。相反,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以物质统一性为基础,既承认自然对人类的先在性与根基性,又强调实践中人对自然的共生改造。一方面,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自然界具有的客观实在性及对人类社会的先在性决定了人对自然的依附关系;另一方面,人在人化自然中与自在自然又是共生关系,人类对自然的保护或者破坏最终会作用于人类,人既不能片面顺从自然而丧失其自身的主体性与改造性,也不能脱离自然界,将自然界看得与自身毫无关联。“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sup>[25]</sup>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援引庄子“天地与我并生”的“天人合一”思想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意蕴,同时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指导,批判性地将传统思想中的“天”界定为物质世界的自然生态系统,将“天人合一”思想界定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消除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天”杂糅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元素,实现了传统哲学智慧的现代升华。

### 2. 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念激活“贵和尚中”交往观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从个体看,“中”代表着情感内在的宁静,“和”代表着情感表达的适度与规范;从社会

看,“中”是世间万物运行的根本,“和”则是世界发展的原则。如果达到“中和”的理想境界,则天地有序、万物共荣。传统哲学中,“尚中”强调适度、不过激、不过弱的中道原则;“贵和”也非单纯的妥协,而是当事物双方产生矛盾时,要把握事物的“度”,避免极端,在多样性和差异性中实现动态平衡。这种平衡并非单纯追求中庸,而是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寻求最优解,确保多元力量互动中的稳定和谐。

儒家伦理中,“君子中庸”的前提是交往双方均以“君子之德”为基(如“君子周而不比”“君子而时中”),本质上是单方面让步达成矛盾调和。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差异使主客观察异质性增强,单纯依靠道德自律已难以支撑安全交往。毛泽东指出“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sup>[17]328</sup>,习近平也指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零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sup>[21]210</sup>。这些论述表明,事物之间是联系与发展的,矛盾是动态且普遍存在的,不同的矛盾在不同的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传统中庸之道停留在抽象道德批判层面,侧重主体内部和解,往往只看到矛盾的一方面;而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观照世界,视人类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sup>[26]42</sup>,强调矛盾双方的协同互动。新时代的“中庸”超越单向妥协,转向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辩证平衡,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指导,将传统“贵和尚中”的智慧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交往原则,是可取的路径之一。

### 3. 以马克思主义人民利益观激活“义利相兼”义利观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朱熹对此句注解为“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四书集注》),朱熹将“利”界定为“人情”,“义”界定为“天理”。“人情”是人的本能喜好,“天理”即孔子所言“天道”蕴含的无私、公正的原则。在孔子和朱熹看来,一个君子,无论喜恶,只要符合道义,就应尽力去做;不符合道义的,即使符合私利也应避免。孔子、朱熹并非全然否定“利”,而是主张义利合一。“利者,义之和也。”(《易传》)“利”是“义”的累积,“义”是“利”的根本。“义”为道义,是行为准则与价值引领;“利”是“义”的结果与外显。单纯逐利者终将失义失信,空谈道义者亦难行久远。

“义”是道德属性的体现,而“利”是社会属性的延伸。在传统社会中,哲学家们倡导的义利观受到封建制度的制约,统治者常以“重义轻利”压制民众

的正当经济需求,“义”的概念偏向个人对君主和国家的忠诚,而“利”被视为庶民阶层不应过多追求的私欲。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义”与“利”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人民的实践之中。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其物质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决定了文化、艺术、教育等活动的发展,因此真正的“义”必须建立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既避免社会中“义”的空洞道德化,也防止资本对“利”的无序追逐,使“义”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指导,“利”成为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成果。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人民利益观重新激活并发展传统义利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公有制保障利益公平分配,“利”不再是少数人的财富积累,同时,“义”的原则也体现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政策之中,更进一步地赋予“义”实践内涵,推动“义利相兼,以利为先”的现代转化,使其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基石。

### 4. 以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激活“天下为公”天下观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孔子基于三代圣王治理之盛世,提出“天下为公”的概念。但彼时“天下”与国家界限模糊,且在封建社会中,公平理想常因统治阶级自利行为受阻,“大道之行”下的“天下为公”更多是对君主的道义呼吁,而非权利归属与政治实践。因此,在古代社会难以真正实现“公道”,百姓利益常被忽视,“公”的追求多为空想,难以转化为社会实效。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突破传统的“天下”概念,将“天下”拓展至天下苍生、公共资源与民族文化,强调民众整体利益高于君主一姓兴亡。如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提到“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指出国家兴衰是统治阶层之责;“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的兴亡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王夫之在《读通论鉴》中强调“公天下”是认识社会关系的首要准则,认为“天下非一姓之私”;黄宗羲则指出天下“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人民才是社会的主体。通过对传统天下观审慎的反省,他们突破了先秦思想局限,为近代平等观和民主主义思潮奠基,却因未脱离封建体制及生产力、生产资料分配等制约,未能将“公天下”付诸实践。

“天下为公”所指向的天下大同,与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相契合。马克思主义以全人类解放为旨归,其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为“公天下”提供了科学路径。马克思指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

贬值成正比”<sup>[9]90</sup>，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异化为商品加剧贫富分化与阶级对立，唯有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方能实现“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sup>[27]</sup>，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与生产关系变革，将“公道”“大同”从空想变为可行的社会变革实践。如今，这一传统智慧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升华为“公平公正、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实现从古典理想向现代文明的创造性转化。

### 三、何以可为：全球化导向下“和合”思想的践履原则

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国际社会面临着日益复杂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和谐共处与合作成为至关重要的议题。“和合”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启示与实践路径。将“和合”理念融入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安全、文明、生态等多维领域，可有效推动各国在合作共建中实现和谐发展共同繁荣。

#### （一）政治共同体的构建原则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sup>[28]471</sup>但在当前国际环境中，部分国家仍固守“以邻为壑”的对外政策，坚守零和博弈的思维。究其根源，这些国家的决策者未能以“天下为公”的和平发展观突破陈旧的“以邻为壑”竞争性思维框架，深陷“你输我赢”的博弈逻辑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既涉及国与国关系，也关乎人际关系与民族关系。

一方面，要实现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谐，需以“克己以礼”，用公平公正的制度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荀子·性恶》）不同个体的德性不同而导致不同民族的德性不同，所以不同的国家在国际冲突中所表现出的处理方式也不相同。例如中国在面对国际争端时，一直秉持和平共处的原则。“但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并将这些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sup>[29]</sup>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已超越传统“国家—民族”思维框架，呈现出“民族—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国家”之间冲突与对抗的复杂局面，所以建立公平公正的制度作为标杆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要实现人际关系与民族关系的和谐，

需“修己以德”，联结世界人民之间的情感纽带。“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天下之“和”始于人与人思想之“和”。“德不孤，必有邻。”（《论语》）人作为知识与德性的统一体，其对知识、德性所拥有的程度，决定了人在实践交流活动中的不同态度与做法。高尚的德性可超越文化壁垒与国界限制，成为连接各国人民共建和平世界的情感纽带，推动“我”与“他”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凝聚文明互鉴的广泛力量。

#### （二）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原则

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安全威胁日益多元化，领土争端、资源纠纷、意识形态对立等风险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各国的安全问题往往超越国界，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局面。习近平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sup>[28]19</sup>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全稳定，“普遍安全”的世界构建便无从谈起。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三国志·吴书》）处理安全问题需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通过宣传教育强化长期危机意识，让“居安思危”理念深入人心。古人“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申鉴·杂言》）的底线思维，在全球化背景下可转化为系统安全观：“防为上”，要求树立底线思维，全面排查风险，强化预测能力，从源头防范危机；“救次之”，需构建现代安全体系，完善应急管理措施，提升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戒为下”，则要从安全事故中吸取教训，破除旧格局弊端，构建新安全格局。新时代培养“防”“救”“戒”的系统思维，居安思危、防患未然，方能有效统筹安全与发展，推动构建更加稳定的全球秩序。

#### （三）经济共同体的构建原则

当前世界格局正在快速演变，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加剧了发展失衡、贫富分化等问题。在利益深度交融的国际局势下，习近平指出，唯有践行“义利相兼、以义为先”<sup>[26]456</sup>的正确义利观，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才能引领世界经济穿越惊涛骇浪、走向复苏稳定。

一方面，世界各国需树立正确义利观。“义利兼顾”是国际合作共赢的基础，“以义为先”则是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应尽的责任。各国在追求经济利益时，应以仁义公正为准则，让国际合作更具平衡性与普惠性。在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中国设立“南

南合作援助基金”,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并计划到2030年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增至120亿美元,这彰显了“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正确义利观与大国担当。

另一方面,需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经济合作机制,引导全球利益合理分配。在经济合作中,“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sup>[30]</sup>拥有平等的话语权,才能推动世界经济合作可持续发展。以“一带一路”为例,通过与沿线国家共商共建,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援建学校医院及铁路等项目,既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又将发展成果公平分配至更多国家和地区,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 (四)文明共同体的构建原则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文化、种族与社会制度的交往碰撞日益频繁。文明多样性并非矛盾根源,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为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文明世界,习近平指出:“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sup>[26]524</sup>

文化是文明的首要前提和核心要义<sup>[31]</sup>。一方面,“和而不同”倡导文化交流互鉴,各国需在全球文化领域秉持“百家争鸣”原则。《左传》云“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揭示不同事物相辅相成的共生逻辑。各国文化与思想亦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文化碰撞并非文明优劣的评判场域,而是以文化的多样性激发文化创新活力。通过推动传统智慧与现代观念深度融合,为全球文化体系注入持久动能。

另一方面,“兼收并蓄”强调尊重文化之间的分殊性与差异性,各国应在国际交流中践行“百花齐放”原则。这一理念鼓励多样化的文化表达与艺术创造,让不同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共同构建丰富多彩的国际文化生态。文明多样性是文化活力的源泉,国际社会需摒弃文明优越论,以平等包容取代对立封闭,通过文化节、学术论坛、艺术展览等形式展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独特魅力。唯有承认差异、包容多样,不同文明才能共同绽放,最终建成“开放包容”的文明共同体。

#### (五)生态共同体的构建原则

随着工业化快速推进,资源过度开发与环境污染对人类生存和地球生态系统构成严峻威胁。为满足人们对生态产品的需求、构建“清洁美丽”的生态共同体,习近平指出:“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sup>[26]544</sup>

在理论层面,“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价值观,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绿色、低碳、生态平衡的理论根基。绿色理念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推动绿色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低碳理念主张减少化石燃料消耗、推广非化石能源、增汇造林以实现碳中和;生态平衡理念强调维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循环代谢,保障可持续发展。这些理念共同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构建“清洁美丽”生态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在实践路径上,“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通过污染防治与系统治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污染防治”践行“道法自然”的预防性原则,通过排污许可制、污染物无害化处理,从而维护自然的自主性,减少人类污染物对自然的破坏;“系统治理”贯彻“天人合一”的整体性生态观,强调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性,以“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加快生态系统物质能量循环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 四、结 语

以马克思主义激活“和合”思想并推动其当代转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以理论创新解决时代新问题的历史必然。在激活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强调“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合”思想追求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皆指向人的解放。思维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强调矛盾的对立统一,“和合”思想主张“阴阳相济”,均包含辩证法理念。二者既有所区别又高度契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互为滋养,不断完善,从理论与历史维度揭示了转化的可能。在激活条件与内容上,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激活“天人合一”自然观,用唯物主义克服传统自然观中杂糅的唯心主义倾向,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念激活“贵和尚中”交往观,用客观辩证思维引领伦理实践,突出交往双方的对立统一;以马克思主义人民利益观激活“义利相兼”义利观,破除传统“君主利益优先”桎梏,强调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以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激活“天下为公”天下观,拓展“公天下”的全球视野,强调全世界人民的自由解放。通过二者的结合,推动“和合”思想在政治、安全、经济、文明与生态等领域的实践运用。本文侧重从哲学方法论层面探讨马克思主义对“和合”思想的激活,未来需在实践层

面进一步拓展具体路径,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和合”思想结合的现实机制与政策设计。

### 参考文献:

- [1] 张立文. 和合学 21 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310.
- [2] 张立文. 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与 21 世纪[J]. 学术月刊, 1995 (9): 3-11.
- [3] 张立文.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9, 33(3): 2-8.
- [4] 陈霞. 和合文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溯源[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8(3): 62-70.
- [5] 吴楠, 钟思雨.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理论内涵与当代启示[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2): 45-52.
- [6] 方盛举, 杨睿哲. 和合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 理论与改革, 2023(4): 39-51.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57.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0]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6.
- [11] Nussbaum M C. Sex and Social Justic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18.
-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
- [13]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 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152-153.
- [14] 习近平.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J]. 求是, 2023 (20): 4-9.
- [15] 李雅兴, 赖晓群. 毛泽东探索“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贡献[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8(1): 17-24.
- [1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71.
- [1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8] 夏禾, 刘化军. 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三次飞跃整体性的四个维度[J]. 学术探索, 2025(6): 83-91.
- [19]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63.
- [20] 习近平. 中国人民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J]. 人民论坛, 2017(S2): 12-13.
- [21]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2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2016 年版[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6: 203.
- [23]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6.
- [24]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 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25.
- [25]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9.
- [2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 [27]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482.
- [2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3 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29] 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修订版. 周琪, 刘绯, 张立平, 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161.
- [3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4 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475.
- [31] 王樊.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形态论析[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5, 54(1): 1-9.

(责任编辑: 陈丽琼)